

外国文艺思潮

第一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外 国 文 艺 思 潮

第一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54,000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统一书号：10094·304 定价：1.20元

出 版 说 明

《外国文艺思潮》主要反映当代外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概况，评述当代国外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介绍和剖析国外文艺思潮及其派别，为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提供参考资料。

《外国文艺思潮》不定期分集出版，由沈恒炎、吴安迪两位同志负责编辑。

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一年三月

外国文艺思潮 目 次

第一集

出版说明

-
- (1) 国外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述要 沈恒炎
-
- (19) 艺术家的自由和责任 [罗] D·马泰依
-
- (26) 当代美国美学的主要流派和问题
..... [苏] B·П·舍斯塔科夫
-
- (53) 列宁,艺术与革命 [法] J·M·帕尔米叶
-
- (71) 三十年代苏联美学中艺术思想性原则的发展
..... [苏] C·K·布尔达科夫
-
- (83) 论灵感 [英] H·奥斯本
-
- (99) 《论灵感》读后感 毛 星
-
- (105) 灵感小议 蒋孔扬
-
- (109) 《论灵感》译后杂记 朱 狄
-
- (113) 美国电影美学和电影理论 [苏] B·П·舍斯塔科夫
-
- (135) 电影对文学的影响 [西德] F·J·阿尔贝斯迈埃尔
-
- (141) 荒诞派过时, 新自然主义流行 [美] R·吉尔曼
-
- (151) 英美的苏联文学史观 薛君智
-
- (167) 传统继承和斗争收获

- 略论苏联文学史 [苏] A·梅特钦科
- (179) 一部研究雪莱和拜伦思想的文学史 杨熙龄
-
- (184) 论当代南斯拉夫的短篇小说 [南] M·马尔科维奇
- (193) 美国小说的新道路 [法] 安德列·勒沃
- (209) 美国小说中的“黑色幽默” 蔡葆真
- (219) 种族冲突和二十世纪美国文学 [苏] C·恰科夫斯基
- (226) 社会的责任和拉丁美洲作家 [秘鲁] M·V·略萨
- (235) 七十年代的日本小说创作 唐月梅
- (247) 近十年来的朝鲜文艺 沈仪琳
- (260) 南朝鲜的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倾向 沈仪琳
- (270) 亚洲和南太平洋地区新兴国家文学的语言困境
..... [美] R·J·克莱门茨
-
- (280) 二十世纪美国诗歌的变迁 杨熙龄
- (292) 苏联诗歌：高涨还是危机？
——苏联诗歌创作演变情况综述 王守仁
- (305) 苏联当代诗歌中的“世界与个人” 翟厚隆
-
- (315) 司马辽太郎的创作思想与艺术 李德纯
- (322) 瓦·宛拉扬昆的文学创作《白鸽》 乘文华
- (328) 克劳德·西蒙与“新小说派” [西德] 沃尔夫·舍勒
-
- “国际莎士比亚协会”在美举行莎士比亚研究报告会 (334) 苏
联文艺界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 (342) 法国《新评论》讨
论“先锋派”文学和党的文艺政策 (351)

国外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述要

沈 恒 炎

近年来，随着世界政治斗争和经济的发展变化，在文艺舞台上，不断出现各种新的文学流派和文艺思潮。我们根据近年来有关国外文学资料，对当前国外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作简要的述介。

作家的责任和“新的共产主义人学”

在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世界上，艺术家都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来认识、反映和评价现实生活的。作为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应该怎样行使他们的创作权利，如何理解艺术家的自由和责任之间的辩证关系？罗马尼亚 D·马泰依在《艺术家的自由和责任》一文中进行了很好的阐述。他认为艺术家的自由和责任“是一种他在人类意识领域的创造和建树能力的尺度。”“创作自由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不带倾向和不受拘束。……而责任又是保证创作方式多样化，从而在表达艺术家自身理想和愿望的同时，也表达人民的愿望、情感和品质，表达他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生活现实和成就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罗马尼亚《社会

主义时代》1979年第11期)

这里应该指出，何止于文艺创作，文艺研究同样也存在“自由和责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和总结文艺实践中的现象、经验和规律，借以指导文艺创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艺研究也必须接受实践的考验。对于文艺问题决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阐释，而应该在考察历史事实和客观效果的基础上，得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苏联德·利哈乔夫在《历史——真理的母亲》一文中，批评苏联文艺研究和评论工作中的不良倾向，指出他们不是运用科学的方法，根据文艺作品的实际内容进行研究，而是依靠“饶有趣味的假设”和“异想天开的假设”等来吸引读者（苏联英文版《社会科学》1978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发展的反映。每个时代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的发展变化以及历史上各种文艺思潮和流派的兴衰更替，都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因此，文艺研究应该探索各种文学发展现象和规律，任何脱离现实的“假设”，不仅不能提供发现真理的方法，相反会使文学研究工作走向歧途。

近年来，朝鲜文艺界强调文学艺术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和文化情感教育的重要性，指出“这是革命发展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朝鲜《劳动者》1979年第5期），并且提出了“主体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应当成为新的共产主义人学”（朝鲜文学研究所：《以主体思想为基础的文艺理论》）的理论。朝鲜文艺理论工作者在阐述“新的共产主义人学”这一理论时，强调了文艺应把政治性和人性正确地结合起来的看法。朝鲜文学研究所所长金河明说：“革命家不仅要有政治

性，而且要有人性。”“政治性是规定共产主义的思想精神面貌的最重要标志”，而“人性则是共产主义革命家身上的又一重要品质”。因此，在塑造艺术典型时，不能只强调政治性，“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政治性和人性是一个整体。”

（《劳动者》1978年第3期）文艺理论家吴承连指出：“政治性和人性的正确结合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文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战斗职能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朝鲜《社会科学》1978年第4期）

社会现实和文学的现实主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的科学技术革命，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科技革命对生活的一切领域，其中也包括文艺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关于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应该如何写作等问题，各国文艺工作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美国J·布赖恩特认为：“现代物理学已经证明，要完整地体现和认识……‘现实’是不可能的。因此，给现实所下的定义也必然是变化不定的，模棱两可的和主观的。”

1975年，美国佳作出版社出版《超级文学》一书，书的编者D·贝拉米在《前言》中也认为，当我们同“超现实的”世界打交道时，文学如何能可靠地表现现实生活，它怎么还会保持是现实主义的呢？

美国文艺理论家D·洛奇在《处于十字路口的长篇小说家》（1971）一书中，更明确地认为，文学永远也不能恢复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叙事长篇小说所具有的那种完美性了。

(参阅苏联《文学问题》1979年第3期)

西德迪特·韦勒斯霍夫在《经验与文学》一文中，阐述了他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在西德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韦勒斯霍夫认为：文学首先应该去反映现实世界，或者说现实生活，描写的方法应该是现实主义的。必须用一种批判的、发展的观点来理解现实主义，应该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倘若现实主义不是崭新的，它的反映方式，它的眼光不是始终变化着的，那么也就算不上是现实主义。关于创作题材，他反对描写琐屑小事，认为应该在现实中深入挖掘那些未知的，尚未被揭示的课题。他说：文学总是间接地影响到人的实践活动，但是作家不应“带着事先形成的一种教育学的观点而把小说仅仅当成工具”，“文学与宣传不同，它通过对生活冲突的描写和它的感人力，要求读者对生活有自己的看法。”

(西德《新评论》1978年第3期)

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波兰出生的美国小说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说：“我确实相信，在文学中，你不能写那些对我们来说平平常常的事情。……作家们应该更多地注意生活中正在进行的情况，着眼于生活正在创造的伟大的崭新的东西，着眼于生活每天都在制造的特殊的指纹。”辛格还说：“一位现代作家在坐下来写作时，总觉得每一句话都必须写得别出心裁，独具一格。……生怕人家说他是在写别人写过了的东西。但是，由于力图讲出一些从来没有人讲过的事，他就造出了一个毫无意义、晦涩难懂的句子。杜撰出来的独具一格只会迷惑读者，同时也会把作者搞糊涂了。”但是辛格反对文艺的社会教育作用，错误地认为，“小说实际上是供人消遣的一种方式：好小说与坏小说之间的唯一不同就是，低劣的文

学供低级的人们消遣，而优秀的文学供比较优秀的人们娱乐。”他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幻想他的作品将改善人类的状况，这实在不好。即使我们的状况将要改善，这件事也不是由小说、诗歌或故事来办。……文学能激动人的思想[※]，但不指导人的思想。”（1978年11月6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为了适应政治需要，苏联文艺理论界讨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讨论是围绕苏联文艺理论家Д·马尔科夫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历史地开放的艺术形式的体系”这一新的理论进行的。简要说来，这一理论认为，“客观地认识不断发展的现实是没有界限的；题材的选取以及对生活真实的表现手段和方法也是没有界限的。”因此，“别的体系的诗学成分加入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体系中来，一般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能的。”（苏联《文学问题》1977年第1期）马尔科夫强调说：“苏联文艺科学的任务在于，从现在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各国文学的共同体中，指出其决定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的性质。在这一途径上能够获得成功的保证的，是可靠的理论指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正现代的理论。”（《文学问题》1975年第8期）Ю·鲍格丹诺夫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世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理论。”“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开放的艺术形式的观点，使他们有可能更密切地注意国际文艺的实践。”（《文学问题》1975年第9期）А·梅特钦科在谈到这个理论的特点时说：“这个方法‘在自己的范围里囊括了最不同的各种能够反映生活真实的艺术概括形式’，那么，这也就是对非现实主义流派，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想哲学的流派开放门户。”（苏联《十月》1976年第5期）从讨论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和苏联所鼓吹的所谓“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学”

的内在联系以及它的真正涵义。很显然这是符合苏联向外扩张的霸权主义的政治利益的。

“现代派”文学和法国的“新小说”

二十世纪出现的现代派，几乎主宰了西方的文学创作。现代派文学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探索人物内心世界的意识活动，否定作品的思想意义。例如意识流、新小说等文学流派，都有这种倾向。自六十年代以来，现代派小说不仅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十分活跃，而且在日本、埃及、伊拉克等东方国家也十分盛行。东方现代派文学继承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创作手法，其特点之一是把作家的注意力引向人们的感性活动、意识活动和内心奥秘方面，例如南朝鲜文学界，1977年设立“李箱文学奖”*，以创作“下意识作品”为获奖对象。第一部获奖作品是金承钰的《汉城的月光》，据说这部作品“对一个日益萎靡不振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性欲下意识，作了追根究底的探索，作品一发表就引起了文坛的轰动。”另一个特点是“反对任何意识形态”，如日本作家椎名麟三的短篇小说《深夜的酒宴》的主人公宣称：“任何意识形态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主张冲突和斗争，甚至在追求伟大的目标——和平与幸福时，它也必然把人类引向战争和死亡的边缘……把意识形态抛给蠢猪去吧！”虽然这些作品在内容上是不可取的，有些作品的思想倾向是反动的，但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等，从另一方面发挥了它的社会认识和教育作用。

关于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意识奥秘的文学手法，已经被东西方国家很多作家广泛运用，使“意识流”成为一种写作技巧的名称。特别是五、六十年代开始在欧美盛行的“新小说”，“意识流”对它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意识流”打破了传统文学作品中的时间、空间观念和顺序，把人物的印象、幻觉、回忆、想像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情景汇合在一起，从而丰富了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事象间的自然程序的颠倒，时间概念上的大幅度跳跃，往往使读者不能很好地理解作品的内容。因此，过多地使用这种文学表现手法是不适当的。也正是基于这些原因，西方作家对“意识流”也存在不尽相同的看法。

美国作家P·兹韦格在《文学中的英雄人物》一文中认为：“现代文学的重大创新——意识流、分散时序论、梦幻叙述法——把我们带到与实践的生活恰恰相反的境地，带到冗长的看不透的思想戏剧当中。”（美国《星期六评论》杂志1978年12月号）

英国著名女作家E·鲍温在《小说家的技巧》一文中认为：“关于‘意识流’这种表现人物的方法有两点值得一谈。第一，这种写法需要用比较长的篇幅；其次，这种写法几乎总是用描写某一人物的个人的平凡经历和他对这些事物的纯粹个人角度的反应。……一般采用‘意识流’手法写的书，刺激性、危机感即存在于人物的身上，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多少给人以没有对准焦距的感觉。”（《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作品中的“意识活动”和“心理描写”。但是，资产阶级的小说创作技巧，并不完全适合于社会主义小说。德国著名戏剧家、诗人B·布莱希特说过：“如果

仅仅通过主人公的内心感受和反省的镜子来反映世界，就不能充分现实地再现世界。不能把全部社会——因果的综合变成心灵感受的简单刺激物。况且，由于旧的技巧仅仅拘泥于描写心理过程，因此无法描写阶级斗争中的个人。所以，从资产阶级小说向社会主义小说过渡，不能仅仅表现在形式的变化上，‘技巧并不是某种’可以脱离倾向的‘外部的东西’。”它“也与内容有关，甚至对艺术家来说，它往往就是内容本身”。布莱希特认为，现实主义理论不能以“过去资产阶级小说”的某些形式为依据，“仅仅从这些作品中吸取形式上的教益”。（B·布莱希特《论文学》，《苏联社会科学文摘[文艺学类]》1979年第1期）

受“意识流”影响而发展的法国“新小说”派目前虽然已经衰落，但是对西方的文学界仍有一定的影响。“新小说”一般比较晦涩难懂，在大多数的作品中，作者都是以一位毫无个性的人物为“媒介”，罗列一系列无关紧要的细节描写，使读者看到人类“毫无意义的生息泯灭”。“新小说”派主张作家对所反映的客观事物不作任何处理和解释，也不考虑小说的连贯性和故事发展的正常时序。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阿兰·罗布·格里耶曾经宣称过“新小说”的创作原则，他说：“在现代小说中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回忆变得特别重要，因为回忆是没有时间性的……”因此，“新小说”的核心是回忆，作者习惯于把过去和现在，现实、梦境和回忆等交杂在一起。

西德沃尔夫·舍勒在《克劳德·西蒙与“新小说”派》一文中，着重介绍了当代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人物西蒙的作品。西蒙小说的核心往往都是回忆，从六十年代的《在佛兰德大道上》（1960）到七十年代的《导体》（1975）都是这样。前一部小说被称为“现代记忆小说”。西蒙主张为艺术而艺

术，反对带有政治倾向的文学。他的作品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很深。西蒙认为：生即死。人的生存只不过是一系列孤立而荒谬的事而已。他在早期作品《骗子手》（1945）中说：“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在时间过程中消失。”“活着是一件荒谬的事，它以另一件荒谬的事而告终，这就是死亡。”在近期作品《导体》中，西蒙“把观察到的情况罗列起来构成一定的思想内容，展现出人生的命运、生与死不断循环的历史。”（西德《法兰克福杂志》1979年第3期）从上述介绍中可以看出，西蒙的作品完全体现了法国“新小说”派的创作特点。

英美小说的创作倾向

近年来，欧美文学有了新的发展，除了现代派小说外，出现了不少主题严肃、思想进步的作品。以美国文学为例，最明显的变化之一，是早先只以个别作家的名字被人们注意的黑人文学，现在已成为独树一帜、非常有影响的艺术领域。不少作品揭示了美国种族主义的地狱里，没有黑色人种幸福生活的绿洲这个现实主题。1976年出版的黑人作家阿历克斯·哈利创作的长篇小说《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描写一个黑人家族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他们如何从非洲被贩卖到美洲，以及他们如何在奴隶主的暴力下被损害被侮辱的生活历史。作品通过这个黑人家族七代人的经历和感受，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历史上反动的黑人农奴制的凶残和罪恶，是一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血和泪的控诉史。通过作品，使读者受到很大的教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量。由于小说涉及到许多学术和社会问题，从而使《根》这部小说，远远超出了一本书和一个国家的

范围。

但是一般说来，西方小说描写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作品还是占多数。当代英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在《暴行之路》一文中说：“劣等文学的市场实际上是怂恿那些想要成名的作家大肆描写对肉体的蹂躏和凶残的暴行，以此来赋予他们作品的活力。美国的情况更是如此。”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变得暴躁、无理智和反复无常了。而今天，这样的人物在电影和书籍中比比皆是。……在海明威的作品中，还有一点点迫不得已的道德、禁欲主义和仁慈，可是在今日美国小说里的人物身上，就连这一点品质也找不到了。”伯吉斯指出，“今天，没有一部美国小说不描写赤裸裸的性行为。在这些小说里，暴行和残杀是毫无原因的。书中没有完整的个性描写，没有道德观念，而是充满轻率的、为所欲为的恐怖行为。”

（美国《星期六评论》1979年2月3日号）

美国小说家J·厄普代克在一次“阿拉伯与美国文化交流会”上的演说中也颇有感慨地说：美国作家“失去了自己的使命感”。“环顾一下现今的小说，苍白无力、繁琐、毫无气魄，有的甚至是迂腐，令人厌恶。”（新加坡《星洲日报》1979年3月2日）

由于受现代派小说和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当代英国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英国文学研究者芮利1979年3月21日在一次英国文学座谈会上说，当代英国文学出现一种倾向，作品反映现实已不被重视，作品本身的故事情节也不很重要了。作家们热衷于探索表现形式，而不是反映什么内容，他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作品的结构和语言方面，反对传统的“开头——中间——结尾”的小说格式。因此出现一些小说，

在结束时仍和开头一样，没有答案，读者甚至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英国文学，特别是畅销书，一般都充满刺激、性描写和暴力场面，而且这种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此外，还有一种描写色情加暴力的所谓“藏在柜台底下的小说”，它们在社会上大量泛滥，使很多家庭感到担忧，但是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西方国家的文学创作出现这种倾向并不是偶然的。战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加深。随着资产阶级文化和社会生活瓦解，理想和道德观念的破灭，资产阶级没落的思想意识必然要反映到作家的创作中来。例如西方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社会发展前途的看法是悲观的，他们认为社会的发展后果也可能会证明“未来是一个希腊悲剧”，“人类也许会倒退到永久的野蛮状态”……这种资本主义的“世界末日感”，不能不影响西方社会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因而使他们精神空虚，不少人表现了玩世不恭的颓废思想，他们酗酒、吸毒，沉湎于酒色之中，过着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在作品中出现这种生活图景，正是资本主义现实生活 的反映。正如伯吉斯在文章中所说：“正因为美国的社会上存在着暴力行为，文学作品中才出现了最罕见的暴行；正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在秩序、文化和信用上的崩溃，文学作品才没有个性。美国关于暴力、恶行、强奸、色情的小说只不过是对整个美国生活的一个出色的写照。”

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文学动态

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拉丁美洲国家，近些年来，文学事

业有了很大发展。秘鲁著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社会的责任和拉丁美洲作家》一文中说：许多作家从过去对社会问题和政治漠不关心开始有了转变，“认识到拉丁美洲国家种种可怕的社会问题而采取了新的态度；他们明智地发现社会种种罪恶并在道义上决定与之斗争”，因此，“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成为文学的中心题材。”（美国《今日世界文学》1978年冬季号）特别是“幻想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拉丁美洲很多国家有了迅速发展。这类文学通过作家的艺术构思，使作品蒙上一层梦境与不真实的人物和事实的虚幻外衣，达到暴露社会上和政治上种种罪恶的目的。被美国《时代》周刊推荐为1976年世界十大优秀著作之一的哥伦比亚著名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盖斯的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1975），“作品从文学与虚构所允许的各个角度反映和探讨拉丁美洲的政权问题”。加西亚·马尔盖斯的作品，几乎都是描写暴君兴衰的同一个主题。这在拉丁美洲小说创作中具有普遍性。1978年，加西亚·马尔盖斯在接受多米尼加《此刻》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必须向反动的社会制度作斗争，我好比一头急急忙忙冲进沙场的斗牛，随时准备发起进攻。”“我不仅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有生命力的，而且还认为，目前必须实行社会主义。”

在亚洲国家，七十年代日本文学的创作倾向较为引人注目。如山崎丰子的《华丽家族》（1973），以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危机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品通过主人公万俵大介父子两代人的思想冲突，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摆脱的困境和矛盾。随着日本人民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